

揭露「港版顏色革命」的來龍去脈

楊志紅 全國政協委員 全國港澳研究會特邀會員 港區婦聯代表聯誼會會長



楊志紅

「一國兩制」在港實踐白皮書指出，要始終警惕外部勢力利用香港干預中國內政的圖謀，防範和遏制極少數人勾結外部勢力干擾破壞「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施。揭露「佔中」的來龍去脈，有助於認清「佔中」行動，就是外部勢力干預中國內政和極少數人勾結反華勢力破壞「一國兩制」的行動。「佔中」不論從策略或目標上，都與「顏色革命」亦步亦趨。「港版顏色革命」的來龍去脈證實，將「佔中」定性為「顏色革命」是十分準確的。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10月14日會見40名建制派議員時指出，「佔中」運動試圖仿照「顏色革命」的做法，脅迫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是違背「一國」原則、挑戰中央權威、漠視基本法的嚴重社會政治事件，是公然違反香港現行法律的非法活動。國務院副總理汪洋上星期六訪問俄羅斯時，回應「佔中」事件，他稱西方國家正試圖支持香港的反對派，目標十分明確，就是要策動所謂的「顏色革命」。將「佔中」定性為「顏色革命」，是十分準確的。

實際上，西方媒體也將「佔中」定性為「顏色革命」。香港「佔中」發生後，西方媒體連篇累牘報道，美國《時代》周刊、英國《獨立報》、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將「佔中」稱作「顏色革命」的香港版——「雨傘革命」。

將「佔中」定性為「顏色革命」十分準確

「雨傘革命」應了中國一句諺語：「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佔中」啟動以來，已經在重複一個無法無天的故事。

美國學者吉恩·夏普所著的《從獨裁到民主：解放

運動的概念框架》，被迫隨者奉為「顏色革命聖經」，在書中夏普基於親身實踐，總結了198種「非暴力抗爭顛覆政權」的方法。事實上，在上個世紀末發生的所有世界矚目的「顏色革命」中，幾乎都可以看到夏普的身影。「顏色革命」的核心思想，就是鼓吹用「非暴力」手段迫使政府改變政治現狀乃至下台。香港「佔中」行動同樣是鼓吹所謂「愛與和平」，目標是推翻人大就香港政改的決定，挑戰中央權威，及後更演變成「倒梁」和妄圖奪取政權的行動。這些都決定了「佔中」的「顏色革命」本質。

一般認為，「港版顏色革命」的「佔中」於2013年初開始醞釀，由香港大學副教授戴耀廷、陳健民及傳教士朱耀明等人發起。但實際上，「港版顏色革命」從楊魁棟和夏千福前後兩位美國駐港總領事任內，已經開始醞釀和操作了。

楊魁棟於2010年3月出任美國駐香港總領事，任期三年。楊魁棟早在接任美國駐香港總領事之前，就專職在中亞國家策劃「顏色革命」，是推翻多個中亞國家政府的直接當事人。華盛頓將策動「顏色革命」的老手楊魁棟調到香港，意圖在香港「照搬煮碗」，並

藉香港「跳板」將「顏色革命」推進到中國內地去。楊魁棟任美國駐港總領事期間，香港成了多事之都，「五區公投，全民起義」等花招層出不窮，楊魁棟還積極策動「佔中」，與「佔中」搞手黃之鋒父親黃偉明、公民黨主席余若薇4次開會，每次長達3小時。他出席美國商會發表演講煽風點火，說香港市民「佔中」行使自由表達意見的權利應受保護云云。

「佔中」關鍵人物就是夏千福

夏千福接任駐港總領事，顯然是要更充分地扮演奧巴馬「重返亞太」的馬前卒。夏千福早年在台灣任職，首倡「寧靜革命」，這是「顏色革命」的另一種說法，民進黨執政使「藍天」變「綠」，是「寧靜革命」的代表作。台灣「寧靜革命」的關鍵在於分裂中國，阻遏兩岸和平統一。美國認為這一套策略非常有效，因此派夏千福接替楊魁棟，在香港面臨特首普選的關鍵時刻，再來一次「寧靜革命」，使香港管治權落入美英支持的反對派之手，將香港作為對中國推行「顏色革命」的橋頭堡。這是美國「重返亞太」的重要佈局。

美國操控「佔中」的關鍵人物就是夏千福，協助夏千福的關鍵人物則是《蘋果日報》的老闆黎智英，黎智英通過來自美國的黑金政治，綏靖反對派政黨和「佔中」勢力在一起。黎智英在2012年收到美國的任務時，就向台灣民進黨提出「佔領中環」的設想，並向民進黨的施明德取經，黎智英邀請施明德等人到家中開會，他向在場人士表示要搞「佔中」活動。黎智英其後為「佔中」、罷課提供大量金錢，極力鼓動

對派採取激烈抗爭行動。「佔中」啟動後，《壹週刊》、《蘋果日報》、《今日美國報》、《時代周刊》、CNN、ABC、BBC採取了同步調，一起宣傳「雨傘革命」。黎智英接受外國記者採訪時，宣稱他是「雨傘革命」的幕後人物，「功勞最大」。

協助夏千福策動「佔中」的另一個關鍵人物是工黨主席李卓人，早前被爆出他收取黎智英150萬元捐款，近日又被秘密文件揭露他透過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旗下的美國國際勞工團結中心(Americ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Labor Solidarity)申請大筆捐贈，至今已接受合共多達1,300萬元捐款。在這次「港版顏色革命」中，李卓人的表現最為出軌，他把立法會的辦公室，開放給學聯、學民及「佔中三丑」作為非法活動的指揮中心，更一直推動「佔中」向激烈對抗的方向前進，顯示他是美國策劃「港版顏色革命」的急先鋒。

美國地緣政治智庫(Land Destroyer)的研員卡塔盧奇(Tony Cartalucci)在該智庫的網誌撰文，踢爆是次「佔中」表面偽裝成以爭取「普選」為訴求的民主行動，實際上卻暗中接收以美國國務院、美國民主基金會和全國民主研究所為首的西方國家機構在財政、政治、媒體等各方面的援助，美國政府此舉是要將香港轉化成境外組織直接影響中國的發源地。資料顯示，「佔中」發起人、支持「佔中」的議員、前高官、政治主教和其他頭面人物，都接受了黎智英的獻金。

國家成最大經濟體 香港反要沉淪?

資深評論員 劉斯路

極端學生有半點惻隱之心乎?

彭智文 教育工作者

香港的亂局還沒有收場的跡象，只有那個周旋還是明智些，及早退出了，其他頭面人物還冥頑不化，似乎真的要香港玉石俱焚。偏偏，我們的國家不但不受影響，而且繼續快速發展。不知那些「佔中」之人是否知道，我們的國家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只是時間遲早的事。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8日發佈的消息指，如果不按傳統現價GDP演算法，而是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GDP為17.632萬億美元，美國GDP則是17.416萬億美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明年按這一演算法中美GDP差距將增大至萬億美元。不過，按當前匯率計算，美國的GDP總值以16.8萬億美元仍無可爭議地超過中國的10.4萬億美元。

因此，美國《華爾街日報》稱，美國依然是世界最大經濟體，IMF的說法不過是另一個錯誤警報罷了。據英國《獨立報》網站報道，購買力平價數字是有爭議的。它需要對大量商品和服務進行比較，因而是一項浩繁的、只能偶爾為之的統計工作，其他時候只能靠估算。

顯然，由於這頗具爭議，北京官方媒體方面也十分低調，沒有歡呼，也沒有歌頌，甚至中央電視台等重要官媒也不提，只是小報說一下。之前，中國的GDP超過日本，北京也沒有什麼歡呼，不過也沒有放鬆，至今已是的日本的两倍了。你說日本怎能不着急？

「佔中」自毀向上流動機會

這回，要說中國經濟規模超過美國，美國能接受？確實，從人均居民收入來看，中國只是美國的十分之一左右。從創新上看，中國製造多、創造少；依靠土地、能源資源大開發大挖掘累積的GDP多；自主創新嚴重不足。全球100名最具創新意識和能力的公司當中，美國有45個，而中國的數字是零。因此，說中國經濟超過美國，不要說美國不能接受，可能香港的大學生更不信。

不過筆者要說，其實中國經濟現在是否真的超過美國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顯示了中國超美的不可阻擋的趨勢。這也是一個里程碑。相信，以舊的計算方法，中國超美也會成為現實。這，就是實力。有實力才有外交；有實力也才有民主。香港的學生，你們明白嗎？

如果不明白，至少也應該清醒香港當下是如何被破壞。據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教授雷鼎鳴測算，從9月28日「佔中」爆發至10月7日，香港損失已達3,500億港元；「佔中」每拖延一天，這類直接的損失就會增加幾分。更重要的是，「佔中」給香港這個「金字品牌」帶來的無形損失，是無法計算的。

參加「佔中」的不少青年是因為香港社會向上流動空間萎縮，看不到前途而對社會產生不滿，因而行為激進。但是，一字咁淺的道理是，社會動亂必然導致經濟受損，而經濟受損向上流動的機會不是更少了嗎？

更為重要的是，這次「佔中」動亂，是公然違法抗法。眾所周知，香港是一個沒有資源的蕞爾小島，之所以一度成為「四小龍」，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有良好的法治。而不少反對派也口口聲聲稱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但是如今正是他們肆意的破壞法治，這樣發展下去，香港未來只有沉淪。

收手吧，回頭是岸！

「佔中」至今半個多月，旺角、銅鑼灣、金鐘仍有不少示威者堵塞主要交通幹道，影響民生，普羅市民深受其苦。

連日所見，堅守堵路者多為大專生，他們不少被極端思維衝昏頭腦。日前，筆者路經新界大學站，當中數名大學生，高舉紙牌，大聲呼籲學生立即到旺角和金鐘聲援，其間有一女士趨前想跟一男生理論，試圖曉以大義，請他們「收手」，勿再罷課堵路。接着，四五名學生包圍這女士，一男生更舉起相機拍攝。該女士平和地說街道上的鐵馬本是公物，幹嗎示威者卻偷來堵路，問他們這算不算是「盜竊」？一女大學生竟然跋扈地喊道：「鐵馬不是政府的，是社會的，即是我們的。」堂堂大學生，竟可說出如此歪理，不得不令人引以為憂。為了自以為的「公義」，就可毋視法紀，甚至做出非法的行徑？這就是我們香港的大學生？該女士續問他們甚麼是「民主精神」，此時他們只管喧嘩，然後報以不屑的噓聲。連民主精神就是「尊重其他人的意見」也不曉得。一方面說願意和平對話，另一方面舉機全程拍攝，這不是無禮和挑撥嗎？

幾日前，筆者到銅鑼灣「佔領區」觀察，一中年男士扶着八十歲的母親到場示威者訴苦，說因堵路，害得年邁的母親不能乘巴士到長者中心，只好步行前往，日前就在路上跌了一跤。男士問學生於心何忍？一學生竟冷然回應：「你們可以乘地鐵。」老婦便道：「不是每處都可乘地鐵！」我們所謂的大學生，有半點惻隱之心乎？如斯「狼心如鐵」，他們的素質，堪見一斑。

以上兩例，可見個別大學生的道德素質確有問題，且充斥狂妄自大、鄙視法律的思維。這班示威的青年人，自矜是「香港未來的社會棟樑」，又謂「珍惜香港」，原來就是要待在街道虛擲光陰，原來就是繼續要參與非法集會。可怕又諷刺的是，「佔中」主事者揭發「公民抗命」，便可把非法行為說得理直氣壯，名正言順，還誓言要繼續癱瘓特區政府。他們以「違法」作為手段，爭取所謂的「公義」和「理想」，這已令人不齒，而更不堪的是要大部分的香港市民蒙受阻塞街道的代價，這又符合「公義」和「民主精神」嗎？

筆者尊重青年人的示威集會權利，但他們絕不可以堵路作為手段，剝奪七百萬市民使用道路的權利。要示威抗議，乾脆申請到維園、大球場吧！開口閉口法治是香港「核心價值」的人，公然違法，如斯下去，究竟要把香港拖累到一個怎樣的境地？堂皇的理想總是騙人的幌子！懇請堵路的大學生三思，撥亂反正，還路於民，重回校園。

為什麼「佔中」行動注定失敗?

文揚 新西蘭聯合報社長

「佔中」組織者們任何與外部勢力撇清關係的企圖都無濟於事。君不見美國21位參議員的聯名信，相當於把美國的真實目的全部公開了。「佔中」就是一個反民主、反普選、反國家的非法活動，面對着強大的護衛民主、保衛普選、捍衛國家的主流力量，這種鬧劇豈有不失敗的道理？

香港「佔中」行動已半個多月，無論還有多少示威者堅持違法霸佔公共道路，也無論組織者還有多少個「下一步」和「新一輪」，都已不再重要。以21名美國參議員呼籲美國政府公開支持「佔中」為標誌，這場運動的失敗就可提前宣布了。失敗的原因，事先就注定了，這一點策劃者自己也很清楚，所以從一開始他們就沒有志在必得的氣勢，但他們還是決定賭一把，先把事情鬧起來再說，然後再寄望北京和特區政府應付失措。令他們失望的是，政府和警方沉着冷靜的處理，沒有給策劃者提供將事態升級的借口。而當幕後老闆美國人不得不走上前台，作一番陳腔濫調，強詞奪理的表態，正好說明活動策劃劇本已翻到最後一頁，再沒有更多了。為什麼「佔中」行動注定失敗？歸納起來，根本原因有以下三點：

「佔中」反民主

正如組織者自己所定義的，「佔中」屬於一場社會運動。但社會運動並不必然是民主或民主化運動，反倒常常表現為反民主運動。「佔中」正是這樣：從目標上看，它反對全國人大設定的普選框架，試圖完全排除國家在香港政改問題上的應有權力，這是典型的「非民

主」。香港特區與中央政府是地方與中央的關係，中央的權力源於維護國家利益的義務，實屬理所當然。以香港地方民主權利的名義，要求中央讓出國家的應有權力，這是哪來的道理？不是非民主是什麼？

而從手段上看，它挑戰法律和秩序，霸佔公共空間，強烈排斥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群，甚至反對整個中國，這又是典型的「反民主」。所有人都會質疑：一旦靠這種方式取得了政治權力，這群人怎麼可能本着寬容妥協的精神推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又怎麼可能阻止另外一群人以更為激進、更為暴烈的方式推翻他們自己？

「佔中」反普選

「佔中」運動宣稱以爭取「國際標準」的「真普選」為目標。但回顧歷史，真正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恰恰都是漸進實現的普選。以英國為例，1761年擁有選舉權的選民不足全國人口的4%，1833年才到了8%，而在聯合王國全部領土上實現一人一票普選則直到1968年才實現。美國也是漸進普選的典型例子。從1789年憲法規定政府由「幾個州的人民選舉」產生算起，到1868年第14條修正案才賦予所有男性白人公民選

舉權，而完全普選則遲至1965年的「選舉權利法」才最終實現。

如果說可以從這些歷史案例中歸納出關於普選的「國際標準」的話，那麼只有兩條：一是「漸進」這個寶貴經驗，二是「激進」這個慘痛教訓。另外，哪怕是歷史上最為激進的「純淨普選」，也從未有過不附加政治條件的情況。1791年處在激進革命中的法國，當時的標準叫做「積極公民」，取得選舉權的條件之一就是已登記為本地的國民自衛軍成員並且宣讀過公民誓言。

對照之下，香港的激進派人士正在企圖在這塊從未實行過任何形式普選的土地上，一舉實現一種不借助任何歷史傳統的、最為激進的「超歷史」普選，而且還是連最起碼的愛國標準都不能設置的「超政治」普選，這不是故意破壞普選進程的反普選，又是什麼呢？

「佔中」反中國

愈來愈多的證據表明，無論是「禍港四人幫」，還是「佔中三丑」，以及學聯和學民思潮，背後的操縱者都是美國和英國。對美國來說，香港的特殊政治環境，幾乎是在主動邀請它將其作為顛覆中國的前沿基地。第一、這是一個因「一國兩制」而令北京的權力不能直接落地的「治外飛地」；第二、這是一個因23條立法未果連叛國和分裂都無法入罪的「法外飛地」；第三、這是一個因「國民教育科」設立未果，讓整個年輕一代完全沒有國家認同的「教外飛地」。如此絕無僅有的特殊地區，美國的陰謀家們不大加利用，豈非咄咄怪事？

「佔中」實為「港版顏色革命」

盧山

前港澳辦副主任、現任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日前在北京與傳媒會面時，指出「佔中」是「港版顏色革命」，是根據某一國情報機關小冊子內的步驟，一步步推演出來的陰謀，手法「萬變不離其宗」。陳佐洱的說法，正好與本月初外長王毅訪美期間，重申香港事務是中國內政，外部勢力無權干預的嚴詞聲明遙相呼應，對一眾寄望「洋主子」隔海聲援的「佔中」搞手們，更是一記當頭棒喝。其實只要稍稍了解一下那幾場在廿一世紀初發生在烏克蘭、格魯吉亞和吉爾吉斯等國的「顏色革命」，就會發現每一場運動背後都有着西方情報部門的身影，其目的不外乎就是透過扶植親西方政權，從而圍堵其他大國。而近日發生的「佔中」，不論是其發展過程、脈絡，都與上述「顏色革命」有着驚人相似的地方，完全是一場以英美為首的西方國家，透過在香港的代理人所發動的陰謀，企圖借此打擊正在崛起的中國。

以陳佐洱對國際外交問題認識之深，在此時此刻將「佔中」定性為港版「顏色革

命」，可見完全是無稽之談，絕非危言聳聽，無中生有。本世紀初發生在烏克蘭和格魯吉亞的兩場由西方在背後策動的「顏色革命」，其動機顯而易見，就是為了圍堵俄羅斯；烏克蘭位處俄羅斯與歐洲的中間，是俄羅斯的戰略前沿地帶，一旦倒向西方，俄國將失去一個重要的戰略緩衝區。至於位處外高加索地區、毗鄰黑海的格魯吉亞，北部與俄羅斯接壤，戰略地位重要，一旦成為親西方國家，就猶如一把直指俄羅斯西南部的「軟肋」的利刃，足以令莫斯科坐立不安。由此可見，兩場導致政權更替的「顏色革命」發生在這兩個特定國家，絕非偶然，都是經過精深部署，由西方國家在背後策動，具有很強戰略針對性。

至於在吉爾吉斯爆發的那場所謂「鬱金香革命」，所發生的時間和地點也絕非偶然：該國位處中亞地區的中心，東面與中國新疆接壤，戰略位置同樣重要；只要受制於西方，足以成為英美等國鑿阿富汗之後在中亞的另一塊戰略跳板，直接威脅中國西北部的國家安全。

可見烏克蘭、格魯吉亞和吉爾吉斯這三個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先後出現政權變天，絕非巧合，而是西方出於戰略需要，在背後穿針引線、密謀策劃和挑撥的結果。

那為何以英美為首的西方集團，這次會看中彈丸之地的香港，依樣畫葫蘆地企圖在這個城市複製一次「顏色革命」？原因很簡單，因為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轄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實施「一國兩制」，北京不能施加直接管治，加上又是個國際城市，完全有條件被利用作為圍堵中國的前沿據點。一些「佔中」主要幕後搞手，近日接二連三被揭發與美國有着曖昧關係，就更能以進一步證明「佔中」是一場名為爭取民主，實則為西方在背後指揮，透過香港代理人進行的另一場「顏色革命」，矛頭直指中國。廣大市民必須認清這個事實，認清這場「佔中」行動的險惡本質，更要認清那些甘願當西方馬前卒，借外國勢力反中亂港的反對派之真面目！